

铁托与南斯拉夫

〔西德〕卡尔·古斯塔夫·施特勒姆



商 务 印 书 馆

544 铁托与南斯拉夫

〔西德〕卡尔·古斯塔夫·施特勒姆

林荣远 王昭仁等译

洪善楠校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 务 印 书 馆

1979年·北京

Carl Gustaf Ströhm

OHNE TITO

Kann Jugoslawien
überleben?

1976 Verlag Styria Graz Wien Köln

内 部 发 行

铁托与南斯拉夫

〔西德〕卡尔·古斯塔夫·施特勒姆

林秉远、王昭仁等译

洪善楠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10 3/4 印张 221千字

1979年1月初版 1979年1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0册

统一书号：3017·229 定价：0.84元

出版说明

《铁托与南斯拉夫》(德文原名“没有铁托南斯拉夫能幸存吗?”)是一本研究南斯拉夫的综合性著作。作者叫卡尔·古斯塔夫·施特勒姆,1930年出生于爱沙尼亚。他的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俄国人。他曾在图宾根大学研究东欧历史,1972年以来任西德《世界报》驻东欧记者。他写的这本书,对南斯拉夫的内政外交(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以及民族)作了概括的介绍;主要内容是:铁托的经历和“铁托主义”体系,着重地谈到“自治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关系;南斯拉夫国内各民族的历史、现状和存在的矛盾;铁托以后的南斯拉夫前景。作者对铁托,对南斯拉夫人民反对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不结盟和坚持独立自主的政策,给以肯定的评价;希望将来的南斯拉夫有一条“没有铁托的铁托主义”路线,抵制苏修向巴尔干和亚得里亚海的扩张,成为保持西欧局势稳定的因素之一。这本书的资料比较丰富,对我们了解南斯拉夫的情况和研究国际问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作者是个西方资产阶级记者,根本不可能用阶级观点分析问题,而且有些观点(例如对斯大林同志以及某些事件等的评价),是不正确的。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分析。

本书的前言及一、二、三章是林荣远翻译的;四、五章是洪善楠翻译的;六、七、八章是王昭仁翻译的;九章是程秋珍翻译的;十至十二章是申文林翻译的。全书由洪善楠校订。

目 次

前言·····	1
一个人和他的时代·····	6
南斯拉夫和苏联·····	46
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	85
铁托主义的体系·····	137
克罗地亚问题·····	162
马其顿的争议和科索沃问题·····	224
模范国家斯洛文尼亚或有个人家园的共产主义·····	253
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的 穆斯林·····	268
塞尔维亚人或软弱的领导力量·····	284
坦克和游击队之间：“全民防御”·····	307
谁是后来人？·····	315
没有铁托的铁托主义·····	327

前 言

没有铁托的南斯拉夫，铁托之后的南斯拉夫——这个命题某种程度上正在酝酿之中。在南斯拉夫，在欧洲的其他地方和西方世界，不仅政治家们和政论家们，而且还有大街上的人，正在提出这个忧心忡忡的问题：倘若这位杰出的人物有朝一日不再执政，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在巴尔干”可能会有所变化，而且是在不利意义上的变化，这个潜在的担忧笼罩着很多谈话和讨论。1976年美国竞选总统时，甚至谈论了这样的问题：假如这个国家有一天遭受苏联突然袭击，美国是否应该派兵到南斯拉夫？在这个有时令人难堪的谈论中，最有趣的是：美国人也好，南斯拉夫人也好，没有任何人完全排除这样一种突然袭击的可能性。

此外，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存在的某种民族上的紧张关系，也是街谈巷议的话题。那么，可能危及南斯拉夫稳定的外部的和内部的势力究竟有多大？

本书试图概括一下铁托时代，同时指出南斯拉夫及其各族人民发展的未来前景。作者意识到，由于这样写法，他将陷入各种火力的夹击之中，因为这个题目具有高度的爆炸性。等待着这个“某一天”的人太多了。一些人希望它的到来，另一些人则害怕它的到来。当一位伟人走下舞台时，不会没有震动的——从最近几年和上几个月的例子中，我们了解到这

一点。

然而，正因如此，必须对有朝一日铁托将遗留给他的接班人的这个南斯拉夫的现状，它的历史先决条件，它的意识形态、经济和政治形势，作一个尽可能不受外来影响的分析。作者力求使他的描述尽量摆脱思想偏见。这不是也不可能是一部“铁托主义”的书，因为作者信仰议会民主，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它也不是一部“反铁托主义”的书，因为作者感到有义务遵循客观的原则。他知道，没有人能做到完全客观。然而，他试图按照伟大的德国历史学家莱奥波尔德·封·兰克的格言，按其固有的前提和问题，直接展示南斯拉夫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和铁托本人的历史和现在。

自从作者在 1954 年——当时是一个骑着小摩托车的好奇的大学生——从的里雅斯特首次跨进铁托国家的边界，去见识这个处于同共产党大国苏联争端中的奇特的共产党国家以来，南斯拉夫这个题目一直萦绕于作者的脑际。在当时和随后的多次旅行中，作者亲眼目睹了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南斯拉夫，学习了这个国家的语言，同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马其顿人讨论过，领略了好客之情和友谊，有时也遇到过不信任和拒绝。他感受了风光的妩媚，这个地区地处东西方之间的边界，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之间的边界，并非始于昨日，而是一千年来就是如此，而且今日东西方国家的人，依然以此为界。作者也未忽略这种边界上的历史的和人类的命运悲剧。他在历史文物里，在要塞的废墟上，在马其顿寂寞的群山中，也在经常不得不遭受艰难命运的普通人身上，发现了这种悲剧。欧洲东南部比我们西部艰难——当人们判

断这个地区的状况和人物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如果说，本书是怀着对南斯拉夫各弱小民族的某种偏爱写成的，那么，作者却竭力不对任何事物加以理想化和美化，也不抹煞罪愆和苦难。

本书不是南斯拉夫的自我描述，它不是用塞尔维亚人的、克罗地亚人的或者甚至是共产党的观点写成的书，而是用一个西欧人和德国人的看法写成的书。它应当对操德语的读者，首先是联邦共和国和奥地利的读者，说明错综复杂的内在联系。它应该既不号召为了铁托而斗争，也不号召反对铁托而斗争。无庸赘言，今天不乏战斗文字。作者不敢沽名钓誉，去丰富这类诽谤书籍的数目。

因此，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将会感到失望，因为他们在这里虽然找到了对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制度的描述和说明，却找不到为之辩护的东西。铁托政权的对手们将会断言，我没有偏袒这个或那个反抗运动，诸如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或大塞尔维亚的君主政体分子。然而，作者认为，这样一种“偏袒”不可能是一位致力于独立自主的历史学家和政论家的任务。不久前，我在贝尔格莱德的党报《战斗报》上读到这样的句子，卡尔·古斯塔夫·施特勒姆是一个“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的顽固敌人”。几乎与此同时，一家激进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的流亡报纸写道，施特勒姆在“为南斯拉夫的宣传效犬马之劳”，而且还很可能接受铁托的贿赂。

好吧，作者既不是“敌人”，也不是宣传员——至于贿赂云云，那是某些南部斯拉夫人显然从土耳其战争时代保留下来的讲述童话的本领——而且也正好保留在几个政治亡命者的

身上。此外，作者坚持那个出自中世纪意大利的见解：“谁要是被教皇派人咒骂为保皇派人，而被保皇派人咒骂为教皇派人，那他就最接近真理。”

但是，围绕着南斯拉夫这个命题所传开的这样一些事件和普遍的神经紧张，清楚地表明：“某些东西正在酝酿之中”。因而更加必要，在分析中不要迷失方向：唯有对内在联系的认识能使我们继续向前。

任何对共产党政治的批评，对铁托的共产主义体系的批评也一样，首先总是必须提出二者择一的问题。如果有朝一日南斯拉夫铁托的共产党人不再在南斯拉夫执政，而可能让苏联人及其帮手们来统治，这能符合西方的利益吗？也能符合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利益吗？那些极端的民族主义的克罗地亚人，准备不惜任何代价摧毁南斯拉夫国家，西方能支持他们吗？作者对克罗地亚人民怀着巨大的同情——但是，如果昔日可怖的争端重演，甚至强大的苏联可能作为“维护秩序的力量”出现，它能象这些饱经风霜的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吗？

每一个从政治上进行思考的人，都必须给自己提出这些问题——当他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某些实践持怀疑态度时，恰恰更需如此。欧洲东南部出现的问题太严重了，以至不能掉以轻心地视而不见。一位德国政治家——微妙的是，他不在波恩当权，而是在巴伐利亚执政——最近说道：他感到遗憾的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片面地面向西北，因而欧洲东南部为我们所忽视。但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让南斯拉夫听任命运的摆布。说这句话的是巴伐利亚总理阿尔方斯·科佩尔——可惜说得太千真万确了。因此，本书不仅想对提供资料

和切实讨论有所贡献，而且也应当致力于再次更强有力地唤起对东南部的醒悟。

我要感谢我的出版人汉斯·扎斯曼博士，他一直耐心地、不厌其烦地关心这部著作的产生。我为拙作在奥地利印刷出版感到欣喜，因为奥地利过去和现在都同这个东南地区保持过很多的联系，今日依然如此。尽管日常政治变化多端，把欧洲的东南部和西部互相联结起来，今后也仍将是奥地利的任务。

我要感谢无数南斯拉夫的谈话伙伴，我同他们进行了有助于我了解某些事物的讨论。最后，我要感谢慕尼黑的兹登科·安蒂奇，他帮助我寻求资料来源和校阅手稿。

卡尔·古斯塔夫·施特勒姆

一个人和他的时代

在当前的国家首脑中，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党的首脑约瑟普·布罗兹·铁托，由于他执政时间之长，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铁托这个名字产生于地下工作和他在共产国际工作时期。他是还在任职掌权的最后一位希特勒的对手。从1976年9月8日晚(中欧时间)中国党的首脑毛泽东逝世以来，他也是最后的一位还健在的约瑟夫·斯大林的伙伴和对手。虽然思想意识有着千差万别，另一种不可低估的共同性把南斯拉夫党的首脑同毛联结在一起：毛泽东和约瑟普·布罗兹·铁托，是那些使共产主义在他们国家掌权的革命的领袖。尽管两人的禀性和情操是如此迥异——比如，看不出铁托有任何在他的中国伙伴身上的那种苦行癖好——，这一事实却突出地显示了同今日统治苏联的那些第三代和第四代子孙们的天壤之别。今天，几乎没有一个莫斯科的领导人，能够说他见过列宁，并在俄国革命中起过那怕是昙花一现的作用。铁托在南斯拉夫，犹如毛对于中国和列宁对于俄国一样——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没有他，就无法想象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和它取得政权的道路。

由此，不仅产生了这位南斯拉夫党和国家的首脑的大部分权威，对他个人的崇拜式的尊敬，也属于这幅图象。这里，再次同毛相似，尽管在南斯拉夫对铁托尊敬的形式没有超越政

治和社会的范围。在贝尔格莱德，没有人会说，他借助铁托的教导，作出了医学发现或技术发明。南斯拉夫舆论对铁托的尊敬，是建立在这个人绝对不受任何批评的事实之上的。不存在有铁托会做错的事情——而且在他的国家里，没有什么政治或社会事件不是铁托可以最后一言定夺的。铁托的话是金科玉律：几个偏离铁托道路的战友不得不认识到这一点，并在沉沦中消声匿迹。

这意味着铁托是一位独裁者吗？铁托是一位经由战争和內战取得政权的人，他的游击队员也不矜持。奇怪得很，虽然有时他也用强硬的手腕统治南斯拉夫复杂的国家机构，但是，他绝不是象斯大林或他的后继者那样，使人们在他面前发抖。铁托的生活作风，至少对一个比较小的而且为严重经济问题所拖累的国家来说，是十分铺张浪费的。的里雅斯特海岸附近的布里俄尼群岛专供他享用，在斯洛文尼亚和伏伊伏丁那，他有游猎行宫多处，还有数辆梅尔切德斯牌 600 型（即奔驰牌——译注）汽车。但是这一切似乎为南斯拉夫人民所接受，把它当作理应属于这个人的。不仅如此，在南斯拉夫，对拥有昂贵的汽车或漂亮的别墅的较低的干部，一再进行正式的（党的机构方面的）和非正式的（居民中的）批评，铁托却是例外。甚至连南斯拉夫共产主义的激烈的对手，对铁托的极度豪华和施尽权势，迄今几乎没有提出过严肃的批评。相反，共产党人也好，非共产党人（肯定也有很多反共分子）也好，都祝愿高高在上的“老头子”长寿——这是出于对他百年之后可能发生的事情的潜在担忧。

谁想评判铁托的政治风格和个人作风，绝不应该用西方

的或者甚至用盎格鲁萨克逊式的清教徒尺度。南斯拉夫不是一个西方的国家。这里没有或只有很少的多元民主传统。即使在你观察这个国家的西部地区——斯洛文尼亚或克罗地亚和亚得里亚海沿岸的一些地区——的时候，也别让巴洛克教堂或威尼斯风格的建筑物，诱使你戴着西欧的眼镜，去看待社会和政治状况。因此，在某种意义上，铁托在这里扮演了一个从前的君主所担当的角色。这位南斯拉夫党和国家的首脑，经常被西方观察家称为“最后一位哈布斯堡人”。这种说法只是很有限地切中问题的核心，因为哈布斯堡家族不是“意识形态”的权威，而只是世俗的、君主政体的权威。然而铁托——1892年5月25日生于库姆罗韦茨，父亲克罗地亚人，母亲斯洛文尼亚人——至少在他的血统和个人生活经验中，肩负着奥匈多民族国家的种种问题。

克罗地亚作家米罗斯拉夫·克尔莱札是铁托个人的朋友，并且象铁托一样，在古老的奥地利的影下长大的。他在一篇政论里指出，苏特拉小河，几千年来一直是处在奥地利（即昔日的施台尔马尔克）和匈牙利之间的边界上，——也就是处在西方和东方的潘诺尼亚广大地区之间的边界上。铁托的出生地库姆罗韦茨就座落在这条河畔。也就是说，铁托出生在一个历史上烽火连绵的地方。他是一个边境上的人。他本人多次引证克罗地亚农民领袖马蒂亚·古贝茨的话语。十六世纪，古贝茨在铁托后来的家乡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山区（萨哥尔热）领导过农民起义，反抗封建领主和当时萨格勒布的主教尤拉伊·德拉什科维奇伯爵。古贝茨在萨格勒布主教所在地卡普托尔被戴上灼热的铁冠，四马分尸。

然而，铁托仅仅由于个人的勇气，他的随从的勇敢无畏和忠诚，才逃脱类似的命运——即作为一个叛逆者被斯大林干掉的命运。在1948年同莫斯科冲突后的最初几周的决定性时刻，他自己就与他那不幸的亲密同乡、农民领袖相提并论，后者由于敌众我寡而失败。当“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共产党情报局）邀请南斯拉夫党的首脑到布加勒斯特，去参加一次他将不得不在苏联代表及其追随者面前辩护或屈从的会议时，他拒绝出席。他预感到，在那里等待着他的的是逮捕、绑架，甚至可能是死亡。他熟知斯大林的秘密警察的方法——他到底作为流亡者和共产国际的干部，在莫斯科“卢克斯”旅馆里，亲身经历了外国共产党领袖是如何在半夜三更被逮捕和绑架的。

然而，把铁托描绘为“叛逆者”，犹如企图称他为“最后一位哈布斯堡人”一样，仅仅切中这位多方面闪烁着光辉的人物的一部分。作为叛逆者，他可能失败了，作为“共产主义的哈布斯堡人”，他也许很快地就在内政和外交问题的漩涡中失去了控制。但是，正是在这一点上，人们不能不赞许这位人物，不管人们对他的政策和思想意识持何态度：他的行动和反应总是有节制的。西方观察家，首先是当他们既非共产主义者又非社会主义者时，如果要把他描绘成一个有远见卓识的人，有非凡策略的机敏的人，是并不需要美化他的。

不过，我们再来谈谈约瑟普·布罗兹·铁托这位“边境上”的人：在他身上，巴尔干的刚强不阿和无所顾忌，同奥地利的随机应变结合在一起，造反精神和策略上小心谨慎结合在一起。因此，铁托没有在三十年代的莫斯科造斯大林的反，虽

然他当时(如同他本人后来所说的)就基本上知道有人在搞什么名堂。在他取名“铁托”之前,开始时化名“瓦尔特·弗里德里希”。这位比较起来毫无权力的共产国际干部知道,揭竿反抗斯大林和苏联秘密警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那样做,他将成为千百万牺牲者中的又一个。因此,他没有二话地从苏联人手中,接过领导南斯拉夫党的责任——虽然他知道,或者因为他知道,他的前任米兰·戈基奇消失在古拉格^①的深渊里。但是,铁托采取防范自身遭此命运的措施之一是,把当时还处于地下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机构,从莫斯科迁移到南斯拉夫。也就是说,他宁愿冒着让南斯拉夫王室警察逮捕的危险,也不愿让苏联保安局逮捕。

铁托如何成功地把一个小小的地下党组织,变成一个群众运动,使他终于经过战争和内战而夺取政权,迄今这仍属于最令人惊讶的命运的转折。在战前和战争期间,铁托是一个政党和运动的首领,这个政党和运动盲目忠于苏联和斯大林。他如何使自己和他的追随者们解脱这种忠诚,这是属于当代历史的戏剧性篇章。很多事实说明,铁托确实任何时候都没有满怀热情地看待过苏联或苏联共产党。在这一点上,他与他的许多下属和同事迥然不同,也有别于米洛凡·德热拉斯。这位门的内哥罗的烈性汉子后来背离了铁托。

在铁托的远远近近的同乡中,看来都广泛地具备着这样一种特色:温情脉脉。如果铁托不是完全不具备这种特色,他的道路是不可想象的。只有行动冷静的人,才能历尽如此之多的沉浮变化,数十年如一日地一直稳坐高位。他周围的伙

^① 古拉格,苏联的劳动教养所。——译注

伴,以及他面对的敌人,却更迭不已。如果说铁托曾经表示过忠贞不渝的话,那么,首先是忠于他自己和忠于由他体现的并打上他的烙印的思想和意识形态。

那么,铁托象有些人说的那样,是一位国际的革命家吗?

或者象人们有时看待他的那样,是一位英明的、成熟的“国父”吗?在这里,回答也不简单。人们目睹铁托是一位国际的革命家,而且有足够的他亲口说出的言论正好证明这一点。他迫害、监禁和杀害过很多他的对手,特别是在战争和战后时代。但是同时,他又根据某种“不干涉”的原则来治理他的国家。今日南斯拉夫社会有很多弱点和问题。它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自由”社会,但也不是绝对“极权”的。谁观察今天的南斯拉夫的现实,都能为他提出的几乎每一个论断找到证据。如果说,南斯拉夫是一个警察国家,那是对的。但是,它也是一个警察有时不发挥作用的国家,正如人们所说的,警察有时会不加深究。如果说,南斯拉夫的党控制着整个生活,那也是正确的。然而,这丝毫没有改变这样的事实:如同在大洋里的火山岛一样,在这个社会里,一再会冒出来“自由的”领域,在那里人们能够听到或读到显然是非正统的意见。

喜欢把政治因素“人格化”的西方世界,称南斯拉夫为铁托的国家。这也是既正确又错误的。所以正确,是这位总统和元帅给这个国家的道路打下了烙印。不过,也可以提出相反的问题:铁托是一党和一国的首脑,在这里,如此多的相互矛盾的倾向和形形色色的王国、民族、文化和宗教的遗产兼容并蓄,难道铁托的道路不是以此为标志吗?有时,人们不禁要问,如果铁托不是克罗地亚人和南斯拉夫人,而是美国人,俄

国人或德国人，他将成为怎么样的人呢？他的生活一开始，似乎就决定献身于“超民族”的个人前途：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约瑟普·布罗兹到过奥地利，也到过德国，做着今天称之为“客籍工人”的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当奥匈帝国军队的卫队长（即下级军官），在喀尔巴阡山被俄国俘虏。众所周知，卫队长布罗兹由于特别勇敢，预定授予他“银质勇敢奖章”——当时皇家和王国军队里的官兵所能得到的最高奖赏。许多年之后，当铁托作为国宾来到奥地利首都的时候，他很乐意地回忆起这种未曾变成事实的、国王给他的荣誉。他当时没有运气得到“银质奖章”：这个勇敢的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的卫队长在 1915 年受了重伤，落到了俄国人的手里。

约瑟普·布罗兹，这个来自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边界的农民的儿子，又进入了一个大的帝国——沙皇俄国的范围之内。要是这两个王国没有在 1917 年和 1918 年灭亡的话，谁知道他的生涯会经历什么样的变化。对布罗兹来说，随着皇帝和沙皇的垮台也就开始了革命。他作为奥地利的战俘，置身于俄国革命运动的范围之中。布罗兹在西伯利亚、彼得堡、接着又在西伯利亚度过了俄罗斯纷乱的年月。他象当时在俄国的许多别的战俘一样，加入了“红军”。这是他第一次同共产主义接触。在他渡过战俘和参加革命的几年岁月后，当他在 1920 年离开俄国回到他的南斯拉夫故乡的时候，照一切迹象看来，他是一个俄国共产主义的同情者——一个在布尔什维克队伍中服务过和同白军作过战的好汉。但令人注意的是：他的正式的和半官方的传记，在处理布罗兹生涯中第一次“在俄国的时期”时，显得含糊不清。奥地利战俘约瑟普·布